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SHIXUE LUNHENG

3

史学论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史学论衡

③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学论衡 (3)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7.

ISBN 7-303-04955-X

I. 史… II. 北… III. ①世界史-研究-文集 ②中国-历史-研究-文集 IV. K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0375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出版人: 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8.875 字数: 448 千字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一 学 术 论 文

普及历史知 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何兹全(1)
古史阐微·····	赵光贤(5)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发展的几个问题·····	晁福林(10)
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	黎 虎(25)
传统社会对妇女角色形象的社会化设计与控塑·····	曹大为(41)
试论班固及《汉书》中为国举贤才的用人思想·····	刘淑英(59)
明中后期至清初江南学者和官员的民生思想与 实践·····	王培华(71)
晚清诸子学略议·····	史革新(92)
试析 19 世纪 40 年代清政府“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	王开玺(109)
关于波斯帝国的王位继承问题·····	周启迪(121)
关于民主政体的主要社会基础与经济基础·····	郭小凌(137)
试论罗马奴隶制的特点·····	杨共乐(153)
关于西方新史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侯树栋(166)
20 世纪日本人价值观念的变迁 ·····	杨宁一(178)
论当代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和影响·····	黄安年(191)

二 教学研究与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11”工程计划草案·····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14)
深化面向新世纪的教学改革 全面推进基地建设 ·····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44)
对研究生教育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253)
对建国以来《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回顾与思考 ·····	
·····	汝企和(261)
推荐一套新颖的高校历史教材·····	鲁瑜(279)

普及历史知识 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何兹全

1994年“白话中国历史通俗演义”的编译者们，约我为该书写序。我写了序，就是这篇文章。但此后该书便无有了下文，也不知出版了没有。

多年来，我是重视并大力提倡通过历史演义普及历史知识，来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我们只要看看、想想《三国演义》、《水浒传》在旧社会民间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就知道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了。现在我把这篇原是序的文章，发表在这里。

历史学有两个任务，一是提高，提高对社会历史客观实际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使人们可以按规律办事，免犯错误；二是普及，普及历史知识，通过普及历史知识，提高民族素质。

“文化大革命”后，出现一种怪论叫作“读书无用论”，这种怪论遗害很大，到现在还能时时看到它的恶劣影响。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有史以前不说，有史以后主要原因就是靠人类能不断从实践中积累经验，把经验写成文字写成书，把积累的经验不断传下去，不断提高。如果没有文字，没有书把前人的经验不断的传下来，单靠个人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恐怕今天的人类仍处在野蛮时期，没有飞机，没有电灯、电话，没有“卡拉OK”，过着点着火把，穿着树皮，吃着生肉，住着山洞、地穴的苦日子。

宣传“读书无用论”的人们，也许正是由于他们读了一点书，看到一些人读书并没有好下场；或者看到一些人读了书用不上不能发财，有所感触发而为“读书无用论”。但无论原因如何，他们

的谈论是错了。

我不把事情扯的太远太广了，单就读历史书来说，读历史是大有用处的，读历史会给你智慧，给你才能，给你高明。我们有句古老的谚语说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鉴就是鉴往知来，看见前面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子就不要再走那条辙。就历史来说，就是看到前代的国家兴亡，就接受经验教训，学它的好的，避开它的坏的。这也就是常说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历史给人智慧，给人才能，给人高明。对政治家说，有了历史知识，熟知历代兴亡，就能避免政治上犯错误，就能知道把国家这条船驶向何方和避免遇礁。对一般人来说，读历史增长了处世接物的才能，对事对人也就少犯错误。对整个社会说，历史能提高民族的文化修养，提高民族素质，使人脱离无知、愚昧。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史书之多浩如烟海。别的不说，就是一部二十四史，就是数千万言，非史学工作者专门治史者是很难遍读也没有必要遍读的。

宋代一位史学家司马光编撰了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历史书，从战国开始一直讲到五代，首尾 1300 多年（公元前 403～公元后 959 年）。他编书的目的是“編集历代君臣事迹”、“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宋神宗赐书名为《资治通鉴》。鉴，是镜子；资治通鉴，就是以历代兴衰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

这是一部好书，不但帝王将相要读，今天国家干部、一般老百姓，仍应该读。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主要的就是来自历史知识。

打开案头世界地图看看，我们看到当今的世界并不怎么平静，好多地方冒狼烟，战火纷飞。我们更进一步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凡举战火纷飞的地区都是落后的地区。哪里落后，哪里就贫困，哪里就有战乱。索马里也好，前南斯拉夫也好，战争不已，天天死

人，都是由于他们落后，经济落后，文化落后。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也向我们说明，中国这一百多年所以有外患内乱，人民穷困，生命涂炭，原因没有别的，也就是由于我们落后。落后，使我们挨打；落后，使我们贫困；落后，使我们受侮辱。

现在好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已走上康庄大道。由小康而大康，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已在地平线上露出曙光。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民族文化还是落后的。封建的贪污、腐败、迷信、荒淫还没有清除，随着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出现的贪婪、腐朽、欺诈、阴狠已涌进来。如何使个人品格，社会风气，民族文化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已是当前迫不及待的工作。

建设健康的精神文明，措施当然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条就是普及历史知识。读《资治通鉴》当然是好的，但是《资治通鉴》是古人用古汉语写的，当前我们一般群众读起来还是有困难的。普及历史知识，我们要用现代汉语，通俗易懂的汉语来写历史。《资治通鉴》已有现代汉语的翻译本，内容好坏，没有读过，不敢妄加评论，但这种意向是好的。

通俗历史读物在民间影响最大的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给人历史知识，给人聪明，给人智慧。在旧社会谁读过《三国演义》，谁就是一方圣人，有人有了难题向他请教，他就会把从《三国演义》里学来的本领，指教别人。《三国演义》也是用古汉语写的，一般人读起来也是吃力的。

在普及历史知识中，我们迫切需要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

高兴的是我们现在看到了这套白话文本的蔡东藩著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蔡东藩，清末民国浙江萧山临浦人，生于清光绪三年，卒于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877～1945年）。他于1916年

《清史通俗演义》问世到1926年最后写完《后汉演义》，前后十年功夫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蔡东藩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在清末革命和改良运动中，他是属于严復、夏曾佑一派的改良主义者。他认为当时民智未开，革命、变法都是过激。他们主张教育救国，救国要从教育作起。清末兴起“演义”潮，“传奇”潮，通过演义、传奇启发民智。在这思潮推动下，蔡东藩写出了《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从这方面说，他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是有意义的，可读的，至少它会给人以爱国主义教育。

因此，把他的书用白话翻译或改写出来，使它能为更广泛的人们阅读，是有意义的，是有益于提高民族文化修养、民族素质，有益于使我们民族摆脱落后，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当《白话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出版问世，报愿为这写序，并借此机会向社会呼吁重视通俗历史读物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大力提倡和鼓励通俗历史读物的出版，把它看作有关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大事来抓。

1994年4月4日

古史阐微

赵光贤

一 夏商周年代考

关于夏商周三朝的年代，即在公元前从何年到何年，现在恐怕还无人能说得出，因此常受外人的讥讽。这真是搞古代史的人很难受的事。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了昵？我愿以耄耋之年再闯这一关。是不是闯过去了，请大家批评。

（一）

先从西周说起。我们必须再谈谈武王伐纣的年代。关于这个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又有新的发现。过去我们只知道在公元前1045年甲子这天武王伐纣成功，但甲子在何月何日则说不出。今天我们知道在此年殷二月二十九日，此日是甲子，并且得到证明。我写了一篇《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日程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在伐纣日程表里，我定武王伐纣的日期是殷二月二十九日，此日是甲子。此说是不是正确，我没有把握。1998年8月，天文历法专家张培瑜先生自南京来，给我一张表，表中有殷一、二、三月不同的三年，其中第二年与二月二十九日甲子之说相符。我看了大喜过望。他并不知我的那篇文章，这样我的武王克商问题不只是公元前1045年的结论得到证实，而且认知了此年的月与日，这是新的大收获。

既然肯定了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5年，则武王即位之年，据《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即位为君当在公元前1055年。

(二)

说到夏商的年代，我感到非常棘手，因为比较可信的材料太少了。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应当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材料，但事与愿违，此书错误太多，根本不能用。例如周昭王十九年南征死于水，《吕氏春秋》、《左传》、古本《竹书纪年》等书都有明白的记载，《帝王世纪》却说昭王寿 51 年，错的太离奇了。这样的书怎能令人相信？我们只有采用古本《竹书纪年》，而此书早已不全，只有断简残篇可用。自然可用的材料就很有限制了。我们还不能直接用它，而只能从《史记》夏殷二代的注解中采取一些材料。

《史记·夏本纪》《集解》“徐广曰：‘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 駉按《汲冢纪年》曰“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索隐》同。

《殷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按这两条都引《汲冢纪年》而与《晋书·束皙传》所说：“夏年多殷”不同。二者比较起来，还是《史记》各注解所说比较可信。

如按周武王建国在公元前 1055 年向上推，1055 加 496 为 1551，是殷代建国为公元前 1551 年。再向上推，加 471 年为 2022 年，为夏代建国之年。这个年数都是以《汲冢纪年》为根据的。此外别无可靠材料作为旁证。我们只好接受这个年代。从西周建国之年再加上推夏商二代，这个 2022 年估计可信，不会大错。

读者或许以为我的说法未免太简单了，这是事实，但我上不识天，下不识地，除了根据书本说话之外，别无办法，只好请读者谅解了。

上文写成后，发现考古工作者有一段文字可为旁证，录之如下：

“二里头遗址”(贤按：在河南省偃师县)根据碳 14 测定的 33 个标本的年代数据表明，第一期在公元前 1900 年以内，第四期在公元前 1500 年左右。第一期至第四期文化共经历约为 400 年的时间。我们根据文献记载的推算，夏代纪年约为公元前 23 世纪至前 17 世纪，共经历十四世十七王。夏代的积年，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为 471 年，《三统历》记载为 432 年，商代的纪年为公元前 17 世纪至 12 世纪或公元前 11 世纪，共经历十七世三十一王。商代的积年为 500 多年，则夏代的积年也不会少于此数。碳 14 测定二里头遗址标本的年数与文献记载推算的年数大致是相符合的。二里头遗址第一期至第三期文化都跨在夏代的纪年之内，而第四期文化的时间已进入商代的纪年之内了。但是即使是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文化的年代也已经不是夏代最早期的文化了。夏代最早期的文化要到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新砦期中去寻找。因此我们认为二里头遗址决不会是禹都阳城。1977 年在河南告成镇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两座东西并列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小城堡遗址。根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实物遗存综合研究，我们认为登封告成王城岗城址是一处夏代的初期的重要城堡，而“禹居阳城”的阳城，它的发现恰好填补了以上夏代早期的空缺。因此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必然只能是夏桀的都城的斟鄩。(方西生：《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存的桀都斟鄩》见《夏文化研究论集》)。

贤按：读了方西生之文，知以二里头遗址的盛衰有碳 14 为证，当属可信。既然二里头遗址是夏桀之都斟鄩，当夏代之末，则夏禹年代当远在其前，不问可知。这与我们定夏初为公元前 2022 年相近，似无多大问题。但亦有人估定夏朝年代过早者，并无根据，置之不论可也。

二 论《河图》与孔子无关

看了光明日报 1996 年 11 月 20 日的《易学研究的突破性进

展》一文，有这样的话：“最早论述《河图》性质的应是孔子。在孔子看来《河图》为‘天降神物’，值太平盛世，圣人当道时出现，因他处乱世，故不得见也。所以《论语》中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说法。”我认为作此文的人对于孔子的学说好像全不理解。《论语》一书是在不同时期很多人所写的，因而常自相矛盾，不能一概而论。《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河图》这东西还不是又怪又神吗？可是他又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两段话是矛盾的，究竟哪个对呢？如果我们对孔子思想有点了解的话，显然后者是错的。尤其是这“凤鸟不至”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古人相信，凤凰出现是有王者兴起的象征。《河图括地象》云：“周之兴也，鸞鷟（凤凰的别名）鸣于岐山，时人亦谓之凤凰堆。”（《太平御览》卷四十）这是指周文王说的。现在这篇文章不举“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单举“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是不是作者认为孔子想称王？孔子在当时不过是一位老学究，现在我们认识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我想当时不会有人认为他会想称王吧！孔子自叹“吾道不行”，也决不能认为他的话是想称王。本文作者引《论语》中这句话，而不引“子不语：怪、力、乱、神。”恐怕是想借孔子的大名为自己的说法撑腰吧！

《河图》、《洛书》盛传于世，但谁也未见过图什么样，书什么样。《尚书·顾命》有河图是不是和这是一个东西？很难说，清初胡渭作《易图明辨》根本否定了它。他认为用《河图》、《洛书》以说《易经》乃宋初陈搏所为。“传者务神其说，遂归其图于伏羲，谓《易》反由图而作。”又因“《易系辞》有《河图》、《洛书》之文，取《大衍·算术》作五十五点以当《河图》，取《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造四十五点，以当《洛书》。其阴阳奇偶亦一一与《易》相应，传者益神其说。以真以为龙马神龟之所负，谓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图。实则唐以前书绝无一字之符验，而突出于北宋

之初。（贤按：此指陈搏）国朝（贤按：指清朝）毛奇龄作《河图洛书原舛篇》、黄宗羲作《易学数象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争之尤力。”（《四库全书总目》卷六）

清初学者反对河图洛书如此之多，何以《进展》的作者一概不提，好像不知有此事，是不是假装不知？但是假装怎能骗人？

一般读过古书的人都知道《易》经是讲八卦之书，自乾卦至于未济，其中引孔子的话很多。因《论语》有孔子的话：“假我数年，五十（或说：“五十”二字作“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孔子学《易》甚晚。今本《易经》里孔子的话非常多，当是后世学者的假托，并非孔子的话。

今本于八卦之后，继之以《易传系辞》其写作时代当然更晚。有“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话。圣人当指孔子，其实与孔子毫无关系。孔子是不说“怪力乱神”的，怎会相信《河图》、《洛书》？这点我希望作者慎重考虑，借孔子的声望为自己的文章助威是不能取信于人的。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发展的几个问题

晁福林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及其相关问题，专家们进行不少精当研究，但其中尚有一些问题还有继续探讨的余地，今依据新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试作研究如下，敬请专家指正。

一

就农业生产工具而言，春秋战国时期比商周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生产工具已属铁制。湖北江陵纪南城水井中出土的铁刃耒耜，柄长 59 厘米，柄下至铁刃端长 50 厘米，全长 109 厘米，铁刃长 7 厘米，刃宽 8 厘米，两木齿间距 3.5 厘米，耒柄微曲，两齿稍前倾，是一种很合用的铁制农具。除了铁刃的耒耜以外，铁制的锄、耨、镰、斧等，也是这个时期常见的农具。《管子·轻重乙》篇载：“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铤、一镰、一耨、一椎、一铎，然后成农”^①，可见战国时期的一般农民已经普遍使用

^① 这里提到的铤，指一种大锄，《盐铁论·申韩》篇谓“犀铤利耜，五谷之利而间草之害也”，可见与耜（锄）是一种农具。铤与耒、耜一样，是当时农民必不可少的农具，所以《管子·海王》篇谓“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铤，若其事立”。所提到的耨，即耨，也是一种锄，其形制比铤为小。《汉书·王莽传》载“予之南巡，必躬载耨，每县则耨，以劝南伪”，颜注谓“耨，锄也。耨，耘去草也。”椎，指铁椎，是一种筑土的用具。铎，《说文》谓“获禾短镰也”，指收获谷物所用的短小镰刀。

了铁制的农具。《管子·海王》篇讲到设置铁官的时候谓“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铤，若其事立”，并且强调“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可见当时的人已经认为“天下”没有不用铁制的耒耜铤等农具进行耕作者。战国中期奉行农家学说的许行“负耒耜”到滕国，孟子曾经问他“以铁耕乎”，并且肯定其农具并非许行自己制造，而是“以粟易械器”（《孟子·滕文公》上）而得到的。可见当时铁制耒耜应当是相当普及的。这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春秋末年，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曾在途中遇见“长沮、桀溺耦而耕”，一边说话，一边干活，“耰而不辍”（《论语·微子》）。长沮、桀溺的这种耦耕，应即手执铁制的耜所进行的劳作。关于耦耕的具体操作方式，专家们有不同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认为耦耕指两人各执一耜并肩而耕，同时将耜插入土中，并力翻土；一是认为两人相对而耕，一人拉动耜上所系之绳，另一人扶耜操作；一是认为以耜为犁，一人扶耜（即犁），一人在前面拉动而翻土；一是认为一人用耜翻土，另一人用耰在后面碎土。盖各种相互配合的以耜为工具的耕作方式皆可称为耦耕，耦耕的实质仅在于“耦”，即两人协作而耕作。《论语·微子》篇所载长沮、桀溺的耦耕方式，从其“耰而不辍”的说法看，应当是一人在前面翻地，一人在后面碎土和平整土地。《周记·考工记》谓“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开挖畎的时候，二人各执一宽五寸的耜，并排挖土，所以挖出来的畎“广尺”，即有一尺之宽。这种以“耦”为单位的劳作，与长沮、桀溺的耦耕又不相同。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农具和铁器已经普遍使用。南方地区，特别是江浙一带，几乎达到了家家可以制作农器的地步。《考工记》谓“粤之无铸，非无铸也，夫人而能为铸也”，郑注“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国工。粤地涂泥多草岁（秽），而山出金锡，铸冶之业，田器尤多”浙江永嘉曾经发现一批春秋战国之际的农

具^①，有铜铲、铜耒和铜耨。这些农具皆有使用痕迹，证明是当时的实用之物。这些青铜农具，还具有地方特点。例如所发现的铜耨，全器呈箭镞形，为双合范铸制，正中为方釜，中空，上端正反两面各有一钉孔。其下端器身分两股向后斜出。两股的正面均施纵线纹，反面则光素无纹，后缘为钝边，前缘有刃。关于耨，《吕氏春秋·任地》篇有载，谓其为“间稼”所用，为耘田除草的农具。永嘉所出土的耨，体薄、有小方釜，两刃斜出，特别适合在水田中除草所用，适应了“涂泥多草秽”的南方地区稻作农事的需要。1977年苏州也发现了一批春秋战国之际的青铜农具^②，包括铜锄、铜镰、铜犁等，其中的五件铜锄有两件形似马蹄，弧刃，上端一面有横梁相连，一面开口，锄高9.6厘米，顶宽12厘米；另有三件，上端两面都开口，锄高7.8厘米，顶宽11.9厘米。这种锄中间开口，可以除止泥涂粘连，很适合在水田里面除草所用。安徽贵池所发现的春秋战国之际的青铜器中有铜斧、铜铲、铜耨、铜蚌镰等农具^③。其中的四件铜耨的形制与浙江永嘉所发现的类似，只是全器呈不规则的菱形。耨的釜在正中，有弧形隆脊，釜端的两股刃亦斜出，正面也有突起的纵线纹，为南方水田耘草的用具，使用时可以不粘泥土。所发现的铜蚌镰，形似蚌壳，长8.5厘米，腰宽3.5厘米，深1.5厘米，底部有两个圆孔，可以将镰捆绑于手上割取谷穗，是相当轻便实用的农具。这些农具的发现，证明郑玄所谓江浙之地“铸冶之业，田器尤多”的说法是可信的。

① 徐定水《浙江永嘉出土的一批青铜器简介》，《文物》1980年第8期。

② 苏州博物馆考古组《苏州城东北发现东周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

③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贵池发现东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按，铜镰在北方地区也有发现。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曾经出土过一件，长18厘米，宽3.3厘米，比贵池所出蚌镰要大，适应了北方地区农作的需要。